



DUOYUAN FANGFALUN

多元方法论 ——对传统方法论的批判与解构

张之沧 张禹 著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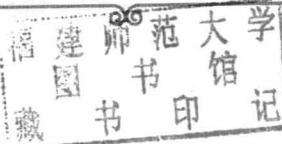


DUOYUAN FANGFALUN

多元方法论

——对传统方法论的批判与解构

张之沧 张禹 著



1030230



T1030230



人 大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方法论——对传统方法论的批判与解构/张之沧 张 离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 - 7 - 01 - 011132 - 2

I. ①多… II. ①张…②张… III. ①多元论-方法论 IV. ①B0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5075 号

多元方法论

DUOYUAN FANGFA LUN

——对传统方法论的批判与解构

张之沧 张 离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6

字数:4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1132 - 2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国家在繁荣科技事业上投入巨大，也的确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的科技队伍，科学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但在令人感到震撼和兴奋的同时，也不无遗憾，这就是迄今为止，国际一流的原创性科学理论和重大的技术发明仍是凤毛麟角，整体水平较国际先进行列仍有较大差距。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当然，导致这种现状和局面的因素很多，诸如政治经济、法规体制、科技基础、文化背景、学术环境、研究理念以及国民性等，都是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相对滞后的重要因素。然而舍此之外，还必须看到在我们的研究传统和思维方法中，一种陈旧过时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狭隘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无处不在作祟的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始终笼罩着我国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堵塞着他们的思维，损伤着他们的想象力，压抑着他们的智慧，耗费着他们的精力，阻滞了重大的理论构成和技术成果的问世。他们至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科技发展史早已证明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思维形式的革命。从古代的神话思维、原子论和整体论的思考方式到近代的归纳法、演绎论、分析法、综合论、模拟法、比较论，一直到 20 世纪流行的直觉论、否证论、试错法、虚构论、建构论、反归纳论、多元方法论、发散式思维、非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人

类精神和主体意识经历了一系列的飞跃与革命。而且正是思维形式的变革打破人类科技活动中那些僵化了的研究传统,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使得每一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与一定的思维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

因此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要想振翅高飞,获得重大的理论和技术突破,除了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关键还是要加速提升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能力,转变科技人员的研究观念,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特别关注当代在非理性和后现代层面上发生的方法创新和思维革命。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站在辩证法的高度,紧密关注20世纪以来流行的直觉论、多元方法论以及赛博虚构和科学虚构等后现代的思维和方法。

本书正是从这种目的和意图出发,以科学哲学、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和人本主义哲学对理性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语义中心主义的批判为背景,从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入手,即从他所倡扬的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怎么都行”的多元论方法、多元比较和选择的方法、“为此目的的假说”的方法、向后回眺的历史方法、对广义理性原则的坚持等理念入手,通过对他的科学哲学批判和理性方法批判所进行的探索性的分析和研究,进抵各种非理性方法,包括机遇和偶然性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科学发现和各种非逻辑思维的关系、身体思维的性质和认识价值以及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学派和新尼采主义者对非理性方法的态度等。而所有这些思维、方法和态度都突出了人的个体性、主观性、协同性和实用性,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都离经叛道:凸显自我表现,蔑视社会认同;反对理性和逻辑,主张非理性、潜意识或无意识作用;反对权威,主张无政府主义;反对人为中心,主张返璞归真;反对一元论,主张多元论;反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主张描述现象、解释学

和解构主义；反对哲学、终极和绝对，主张多标准、多规则、多模式和相对主义；反对群体意识、国家形式，主张个体主义和纵欲。

其中，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在反思前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所创立的独具特色的知识考古学和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为20世纪以来流行的多元方法论大增光彩。这种理论和方法尽管更多的是倾向于对于知识和真理的辩护，也即主要属于辩护和证明知识真理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既然是方法、是工具，那么它也就同样可以被人们用来从事知识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况且在福柯那里，一切语言和文字都是对死的超越，对生的延续；都是一些经由语言自身建构的本体论的事件和实体。正是在人类的语言中，人类发现它自身的影像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无限地展现、再现和转化自身。正基于此，福柯为了发现带有真理性和实用性的科学、知识，立足知识考古学，利用语言分析法对人类的文化史、知识史以及有关社会结构、话语背景和权力性质进行了全面透彻地分析，并从各个方面对长期统治人类历史进程的理性、主体性、现代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形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将以理性和科学为根基的结构主义推到一个历史学和解释学层面，形成一种独到的、旨在解构理性、解构形式逻辑、解构当代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后结构主义以及一种具有历史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特征的知识考古学及其方法论。

与福柯不同，吉尔·德勒兹在方法论上则彻底走上解构主义，以至他的欲望生产说，可谓是在当代多元方法论中的一种革命性力量。在德勒兹看来，欲望作为一种天生的反叛因素到处发挥作用，而且无论在哪里，它都是真正的生产机器。它生产行为和罪恶、知识和激情、快感和疼痛、焦虑和愁苦。它本质上是非中心化的、片

断的和动态的。它作用于不受任何规则或逻辑限制的自由的综合领域。在那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且它总是寻求超出任何社会体所能容许的常新的目标、接触和联系,追求游牧且多样的流动。德勒兹将欲望描述为持续流或一种机器的解构主义做法,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拉康的力比多理论相呼应,既有助于解构主观和客观、现实与幻想、有机论与机械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传统的二分结构,从而有利于确立他的有关“欲望创造了一切社会和历史现实、构成社会基础结构的一部分”的一元论,也有利于他利用唯物论将弗洛伊德主义推离家庭领域,使其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场域。正是基于对欲望和认知实践之间紧密关系的认识,德勒兹确认欲望的功能就是一种持续不断且无所不在的创造流和强烈的情感流,并以多元和弥散的方式体现出来。

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不能够排除辩证法,因此本书同样从“对立统一的方法、具体有效的方法、普遍联系的方法、追本溯源的方法”等多角度、多层次,试图丰富、发展人类思维的最重要成就——辩证法;并力图处理好辩证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包括辩证法与一般科学方法的关系、辩证法与西方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关系、辩证法与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关系,以及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关系、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理性与直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形式之间的关系、理性和无意识、本能、情感、意志等认知要素的关系。然而辩证法即便在理论上也没有一劳永逸和停滞不前,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叫做辩证法。尽管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辩证法在理论上完成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三统一,使其具备了相当完备的理论形式,但是在实践上,经典辩证法的形式性、思辨性和其后蔓延开来的教条主义,还是使得许多西方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诸多问题,并由此创立了一系列有关辩证法

方面的理论和学说,类似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以及萨特的“人学辩证法”或《辩证理性批判》等,都可谓20世纪以来人类对辩证法的继承、批判和发展;也都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对辩证理性进行的新的解读、创造和提升,从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给人类提供了更新颖和更具实践性与实效性的理论、学说和方法。而所有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研究方法、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上,不仅可以使人变得更聪明、更智慧,而且作为最行之有效、最普遍和最具体的方法,完全可以为我国的科技发明和理论创新提供一些思想、观念和路径上的帮助。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对传统方法论的批判	(1)
一、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	(3)
二、对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	(24)
三、对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批判	(31)
四、对理性方法的批判	(39)
第二章 对科学史及多元增长模式的借鉴	(44)
一、对唯物史观和方法的借鉴	(45)
二、论科学增长的多元模式	(49)
三、科学发展的多重动因	(54)
四、矛盾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	(59)
五、理论转变的间断性和连续性	(63)
六、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和非科学	(72)
第三章 多元论方法	(92)
一、多元比较和选择的方法	(95)
二、“为此目的的假说”的方法	(98)
三、向后回眺的方法	(103)
四、创造与模仿	(107)

五、认识与激情和兴趣	(114)
六、科学发现与机遇	(119)
七、理论创新与非逻辑思维	(123)
第四章 “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140)
一、“怎么都行”的原则	(145)
二、自由的思维和方法	(151)
三、反对科学沙文主义	(159)
四、主张相对主义	(166)
第五章 非理性方法	(177)
一、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态度	(178)
二、感觉的逻辑	(186)
三、差异理论	(191)
四、欲望生产说	(195)
五、块茎状思维模式	(207)
第六章 知识考古学和后结构主义	(212)
一、对传统历史考古方法的批判	(213)
二、知识考古学的语言分析法	(220)
三、知识考古学中的后结构主义	(228)
第七章 身体认知的逻辑	(234)
一、生命冲动与认知	(236)
二、力本论的身体	(242)
三、身体结构的认知作用	(253)
四、身体场和知觉场	(261)
五、身体认知的超越功能	(266)

六、身体思维和人类智慧	(272)
第八章 后现代思维和科技创新	(279)
一、神话思维和发散思维	(281)
二、否证论和试错法	(286)
三、经验建构论	(291)
四、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	(295)
五、创造性思维	(303)
第九章 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	(314)
一、对立统一的方法	(316)
二、普遍联系的方法	(321)
三、历史分析的方法	(325)
四、追本溯源的方法	(330)
五、辩证法的方法论特点	(336)
第十章 对经典辩证法的超越	(349)
一、总体性辩证法	(349)
二、启蒙辩证法	(358)
三、否定的辩证法	(367)
四、具体的辩证法	(379)
第十一章 对多元方法论的评价	(388)
一、多元方法论的合理性	(388)
二、一元和多元的统一性	(408)
三、辩证法视野下的多元方法论	(417)

第十二章 多元方法论的启示	(427)
一、丰富和开放了辩证法的内涵	(428)
二、坚持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法	(433)
三、坚持广义的理性原则	(453)
参考书目	(466)
索引	(475)
后记	(498)

第一章

对传统方法论的批判

对传统方法论,尤其是对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特别是对归纳方法的批判,除了来自唯理论者笛卡尔之外,较早对归纳方法所获得的可靠性进行怀疑和批判的就是英国哲学家休谟。休谟怀疑人类感觉的可靠性,怀疑经验事实的科学性、精确性和充分性,怀疑归纳逻辑的有效性,当然也怀疑检验手段的简单性和局限性。接着便是唯意志论者叔本华对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建立起来的理性堡垒的批判。继而是尼采、哈特曼(Hartman)、法国的布特鲁、丹麦的克尔凯郭尔等人。他们在本体论上,试图超越传统的主客对立和心物对立,寻找自在世界。为此,把既非物质又非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人的情感、意志、本能、欲望和生命力等当做一切存在的基础和万物的本质。在认识论上,否认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作用,反对科学、概念和理论的认识价值,主张直觉、冲动和意志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没有人之意志,仅凭理性思维一事无成。人从事发明创造的激情与原动力是意志,不是理性;理性只是意志的仆从。特别是尼采,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突出权力意志的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坚忍不拔的强力,主张自由意志,走向超人学说、反宗教主义、反道德主义和铁锤哲学。此后,新尼采主义者又把反理性主义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而在科学哲学领域,对传统方法论,也即对理性方法、逻辑方

法和科学方法论的批判,主要发端于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归纳方法提供的科学认识的可靠性的怀疑和批判,而从根本上否定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经验归纳法和孔德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经验证实方法的哲学家,则是主张批判理性主义和提出否证论方法的波普尔。波普尔一方面主张用直觉、灵感、顿悟、想象等非理性、非逻辑的方法来补充以往的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又强调试错法在科学发现和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性,主张科学无非就是在尝试性方法或爱因斯坦所谓的“思想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大胆的猜想和假设。

如果说波普尔对传统理性方法、实证方法、归纳方法的批判还都是建立在一种经验论基础上的羞羞答答的批判和否定,那么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与理性告别》等著作中,可以说是第一次比较自觉地运用了辩证的历史观分析研究了科学史及科学哲学、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等问题。列宁说过,“辩证法包括历史性”。而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的导论中,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他研究科学史、科学方法论以及确立一种朴素的、辩证的历史观的目的,就是旨在反对和否定传统的方法论,特别是旨在否定那自认为是“普遍有效和永恒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此,他十分灵活而又不失原意地运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他的多元方法论的研究宗旨。他转述列宁的话说:“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最好的方法论者“可能想象的更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①。“历史是充满意外的和同时发生的

^① P.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9. pp. 17–18.

并列的离奇事件的”，而且它向我们证明了“人类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人的任何特定行为或解决的最终结果的不可预测性”^①。他认为由于科学史和人类史一样“本身就像它们所包含的观念那样”是复杂的、混沌的、充满错误和引人入胜的，而这些观念本身又像产生它们的那些人的头脑那样是复杂的、混沌的、充满错误的和引人入胜的，因此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也必然是同样情形。然而，一旦经过一些人长时间的清理和宣传，它就变得更愚钝、更单调、更“客观”和更易于借助严格的、不可变更的法则来解决。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今天的科学教育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它通过简化科学史实来简化科学，并通过限制某个研究领域以及把该领域同历史中的其他领域分割开来而将其孤立，继而给这个领域一种僵固不变的“逻辑”，用这种逻辑对学生进行训练，然后借助这种逻辑在该领域内进行工作。这样，一方面不仅使该领域的科学作用与价值变得乏味单调；另一方面它也大大减缩、凝固了科学发展进步的历史。针对这种对于科学及科学史实的简单化、形式化和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及做法，费耶阿本德首先从各种事件、史实、原因和背景条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在一起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从科学史、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是一个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的过程，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从不变的历史观出发，既严肃又透彻地批判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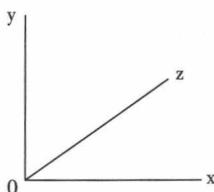
费耶阿本德认为传统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不过于逻辑经验

① P.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9. pp. 17-18.

主义。然而,正是在他们那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认为他们从狭隘的理性主义出发,从不变的、静止的、绝对的、确定的、永恒的逻辑形式出发,要人们离开活生生的客观世界和历史事实,局限在抽象、空洞的逻辑思维当中,遵循着他们所规定的一成不变的、死的方法和规则去重构什么理论。这只能是对科学进步的障碍。而不摧毁这种障碍及对人的思维的束缚和压抑,科学就将失去其活力。所以,他在《反对方法》一书中,一开始就对逻辑经验主义所坚持和固守的种种教条和经验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1. 没有不变的知觉和事实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在科学史和人类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比如由三条线段构成的一个图形,在 A 看来是通向三个不同方向的三条路线;在 B 看来,则是一种开口向着观察者、由两个面围成的折角;在 C 看来,则是由三个面构成的一个图形(如下图)。



“同一个图形”由于不同的认识主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知识素养、不同的理论框架和不同的语言系统,往往会导致产生不同的观察事实。这样,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似乎是不可辩驳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事实”,到了近代就发生根本性变化;同一种

“知觉印象”却变成完全相反的事实，不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日而行。过去在一般科学家或科学史家看来，伽利略捍卫哥白尼学说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伽利略运用观察、实验，尤其是利用亲手制造的望远镜所增加的正面证实的事实所导致的。而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这一重大的转变事件却主要不是由于上述因素，而主要是由于伽利略的坚定信念，由于他“利用宣传，利用心理学技巧，加上他所能提出的一切智慧的理由，正是这些机巧非常成功地导致了他的胜利”^①。比如他发表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在运用一种智慧和说服的机巧，所以不是正面增加的事实导致哥白尼学说的胜利，而是智慧的机巧、理由、惯性定律、相对性原理，使人们感觉太阳系的核心发生变化，导致原来支持亚里士多德体系的“事实”转变成支持哥白尼体系的事实。因此，在具有一定辩证思维能力的费耶阿本德看来，整个科学史，是不存在实证主义哲学或分析哲学所认为的那样一些一成不变的知觉、事实、事件及结果的。实际上，这一切都由于渗透着各种不同的认识论、方法论、知识背景及语言环境等诸多因素而因时因人而异。正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当产生意识感觉的情形与一种特殊的认识类型相联系时，它就变得孤立、不合理，明显地表现出与其他情形不一致”，“而当与新的观察方式、新的知识概念相结合时，我们就获得了新的物理实体”。^② “所以，科学家的产品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③

费耶阿本德既看到了知觉、事实的变化与差异的绝对性，同时

① P.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9. pp. 262–263.

② P.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9. p. 269.

③ P.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9. p. 269.